

翻译伦理研究

A Study on Translation Ethics

杨镇源 著

翻译伦理研究

A Study on Translation Ethics

杨镇源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伦理研究/杨镇源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9
(学术前沿)

ISBN 978-7-5327-6221-7

I. ①翻… II. ①杨… III. ①翻译学—伦理学—
研究 IV. ①H059-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2800 号

本书所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翻译伦理研究

杨镇源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25 字数 203,000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6221-7/H·1132

定价: 3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64511411

本书属于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翻译伦理研究”（批号SC11C019）及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课题
“文化全球化视阈下翻译的伦理问题研究”
（批号ZYGX2012J135）阶段性研究成果

序：翻译存在的伦理性

伦理性是翻译存在的一个侧面、一种途径。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人际关系，就有人际关系的规范，因而就有伦理。按照存在论的说法，翻译自发生之始就进入了一种译者存在论的“此在”之“在”中，译者与原文作者、出版商、译文读者等行为主体彼此产生在场或不在场的交流，这当中任何一方都不能是出于或锁闭于自身又归于自身的“同一者”，既建构自己，又建构对方，尤其是在建构对方时建构自己。在此过程中没有单一者，因为任何存在都同时内含了对方。事实上，一切真理都是一种预设、一种行为主体的共识。在这些行为主体之间的二分描述，不是对立性质的权力二分，而是互相涵摄，一体两翼的构成关系。或者说，各个行为主体彼此存在于无限的罗网之中，没有单一的中心，只有单一的非中心的存在。这张罗网在很大程度上由各种人际关系撑起，各个人际环节都有可能导致翻译活动的不同事实表征乃至价值内涵。

现象学家胡塞尔认为：“一切问题中的最大问题乃是功能问题，或‘意识对象’的构成的问题”，“构成”在胡塞尔那里，往往指“客观世界的构造、客观空间的构造、本己身体性的构造、本己人格的构造、自然和精神世界的构造”（倪梁康，1999）²⁵⁵，即物我、他我之间的“交互主体性”。根据“交互主体性”，物我之间、他人与自我之间，都是一种结构关系，关系中的各项只有

功能性,只有在被置于当下与之相遇的“构成”对象中时,关系中的各项才能获得意义和价值。无限的关联和相互依赖,使得任何单一者都失去了存在基石的地位,这也成为后现代主义者高呼“去中心”、“反逻各斯”、“反对后设叙事”等解构口号的理由。与之相应,哲学界逐渐质疑经典符合论,消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释放出被现代主义压制的自我,注意到“此在”之缘起,成就了从“它是”到“我是”之转换(萧诗美,2002)⁵。但“我是”不是我之孤起,而是我与历史、环境、群体意识的圆舞共存。《云笈七签》中言:“我命在我,不在天地”^[1]。虽然悬置了天与地,但“我命我在”之“我在”却依然要在实践层面上与设置了自身的诸要素打交道。在翻译中,译者从对象那里获得界定。任何界定都必须把被界定者至于其关系之中,置于其对象化的客体中。被界定者也只有在与之发生关系的诸对象那里获得自身的身份与价值。孤立的主体或对象是不存在的,一切主体都是在对象那里获得其自身规定性的。具体地讲,译者在直视对象(原著)时,他是以一种群体意识的综合体滑入对象的,而非单一“净化”的主体。这一群体意识是由译入语、译入语文化、读者期待视野所构成。也就是说,译者在将视野滑入对象时就已经不是单一的主体,而是一种“视野融合”后的过滤处理。以译者为中心,各个行为主体形成影响翻译活动的种种关系要素,进而构成一张伦理网格,使翻译的存在呈现出不可忽视的伦理性。

遗憾的是,在很长的时间里,伦理性在翻译界并未成为一个学理性的话题。与此不相应的是,中西译界在翻译批评方面却从来不缺乏伦理话语,从东晋释道安“因本顺旨,转音如已,敬

[1] 《道藏》(第22册)。

顺圣言,了不加饰”(道安,2009)²⁴的佛经翻译主张到近代严复“信达雅”的译事准则,从古罗马斐洛对《圣经》译者远离“尘世不纯”、安于纯净宗教生活的资格限定(谭载喜,2004)²³到近代法国阿布朗古尔“丝毫也不要怕”把原著带上法国色彩的声明(谭载喜,2004)⁸⁷,种种声音均表现出强烈的伦理关涉。然而在现实面前,翻译伦理研究明显滞后。按照译界普遍公认的说法,连“翻译伦理”这一概念在西方译界的诞生至今尚不足三十年。至于中国译界,相关的研究更是近十年才逐渐兴起。在这样的背景下,杨镇源博士以自己扎实的学术功底、良好的研究素养、独特的探索视角对翻译伦理展开研究,在译论界发出伦理研究的强音,这不能不说令人欣喜。

《翻译伦理研究》一书梳理了翻译伦理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并以关联的视野,对该领域现有理论进行了批评,并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面对贝尔曼、韦努蒂、皮姆和切斯特曼等译学界知名专家的理论,该书表现出客观求实的态度,以及敢于探索的勇气。更难能可贵的是,该书并没有止步于西方理论,而是从中提炼升华,依托于当前文化全球化的背景,结合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诉求,提出以“守经达权”为核心的翻译伦理建构思路,体现出中国学者不跟风盲从西方译论,坚持探寻中国译论自身特色的学术精神。总的来说,笔者认为该书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对现有理论成果展开批评,展现出翻译伦理研究可观的提升空间。在肯定贝尔曼、韦努蒂、皮姆和切斯特曼等前辈对于该领域研究重大贡献的同时,该书也指出其理论局限,如贝尔曼对于行为主体过于理想化的要求,以及看待翻译伦理过于狭隘化的视野,韦努蒂在改善译坛权力关系的迫切渴望中表现出的过度激进态度,皮姆对自己功利主义倾向的忽视,切斯特曼流

于简单化、零散化、杂乱化的翻译伦理模式等。此类局限揭示了该领域研究有待思考、发掘的区间,也因而蕴藏着新的理论生发点。

(2) 将西方元伦理学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融合,形成一条翻译伦理建构的特色思路。该书基于元伦理学区分价值与事实的理论点,切断如“忠实”、“通顺”、“信达雅”等译文面貌与翻译评价的必然联系,反对将事实表征与价值内涵混为一谈,再借鉴《尚书》与《宋史》中“守经达权”的伦理观念,主张在价值层面坚守道义,在事实层面灵活变通,造就了一种富于韧性的伦理建构力量。

(3) 结合中国当前的文化软实力诉求,为中国译坛提出指向文化全球化的对策性建议。“守经达权”的思路带给中国译坛的重要启示在于一种伦理倡导,即坚持对文化差异的尊重,同时鼓励根据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需要而采取变通的翻译策略。前者形成战略导向,既促使文化他者移植入中国的文化土壤,又促使中国文化特色在外国读者那里得到彰显,以此增强中国文化的对内吸纳力与对外辐射力;后者形成战术策略,促使翻译不拘一格、随机应变地采用各种方法,避开中国文化在文本迁徙过程中对内吸纳与对外辐射的重重阻力。两者相辅相成,协同推动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增长。在当前中国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文化软实力诉求与日俱增的背景下,该言论的意义不言而喻。

该书所发出的声音,是多年以来翻译界伦理话语在学界的一种回响,尽管这些话语在长时间里并未被正式冠以“翻译伦理研究”之名。它是学者对于翻译活动中行为主体间关系规则的审视结果,昭示着翻译存在的伦理性,体现着其“此在”的“共在”本质。在伦理这张无所不在的网络中,行为主体的每一次运动,总是出离于自身,是自身的不断涌现,是一次存在可能性

的冒险,要经历一个不断选择自身、生成自身并沉沦于自身的过程。面对无数的可能性,作为形式化(或再度形式化)的新生命总是只选择一种它最本己、最有所倾向的可能性而生发自己、出离自己,把自己让渡给一个个新我。在人际关系的大网中,它不断地进行自我伦理解构,同时又不断地进行自我伦理建构,以伦理话语之肉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体验人际关系,趋向自身存在的真谛。

该书的作者杨镇源是个有坚定学术追求的青年学者。他喜爱读书,擅长思辨,既能够踏实治学,又具有强烈的学术开拓精神。这部20多万字的著作,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凝炼、沉淀的结果,相信会给翻译领域的研究带来推动和启迪。在治学的道路上,每一个学者都是一种历练的存在,都在学术的道路上不断地与他者接触、碰撞、融合,为自身带来更多的丰富和成长。我既期望,也相信杨镇源博士能够在此道路上孜孜以求,不懈探索,在学术洗礼中收获更丰盛的成果,取得更杰出的成就。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成员、
四川省人事厅学术与技术带头人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
冯文坤

2013年3月19日于成都成电花园

目 录

引 言	1
1. 选题缘起	1
2. 研究思路与方法	8
3. 难点、创新点和意义	12
4. 主要结构	15
第一章 翻译伦理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17
第一节 理论起源	18
1. 文艺学起源	18
2. 哲学起源	22
3. 语言学起源	28
第二节 产生过程	30
1. 产生的背景	31
2. 概念的提出	33
3. 理论阵地的建立	35
第三节 发展、影响和前景	38
1. 发展历程	38
2. 学术影响	40
3. 前景展望	43
第四节 相关争论	47

1. 皮姆对韦努蒂的批评	47
2. 罗宾逊对贝尔曼和韦努蒂的批评	48
3. 科斯基宁对韦努蒂和皮姆的批评	50
小 结	53
第二章 学界研究概况	55
第一节 主要学者及其学说	55
1. 贝尔曼:迎向异质的翻译伦理	56
2. 韦努蒂:差异伦理的突起	59
3. 皮姆:文化间性中的译者伦理	62
4. 切斯特曼:基于价值的翻译伦理模式	65
第二节 代表著述	69
1. 《异的考验》	69
2. 《翻译之耻》	72
3. 《回归伦理》	76
4. 《民族、语言和翻译伦理》	78
第三节 基本概念	81
1. 翻译伦理	81
2. 差异伦理	83
3. 合作	87
4. 圣哲罗姆誓言	89
第四节 核心术语	91
1. 纯目标	92
2. 僭越性忠实	93
3. 文化间性	95
4. 价值	97
小 结	100

第三章 现有理论批评	101
第一节 对贝尔曼的理论批评	102
1. 意义	102
2. 局限	107
3. 启示和教训	112
第二节 对韦努蒂的理论批评	113
1. 意义	113
2. 局限	118
3. 启示和教训	123
第三节 对皮姆的理论批评	124
1. 意义	125
2. 局限	128
3. 启示和教训	132
第四节 对切斯特曼的理论批评	133
1. 意义	134
2. 局限	139
3. 启示和教训	143
小 结	144
第四章 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翻译伦理的建构与推行	145
第一节 背景:文化全球化	146
1. 全球化的文化内涵	146
2. 文化全球化的影响	148
3. 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翻译的伦理抉择问题	151
4. 面向文化全球化的翻译伦理建构之思	153
第二节 着眼点:价值与事实	156

1. 西方元伦理学对事实 and 价值的区分	156
2. 价值:战略导向	161
3. 事实:战术平台	163
4. 着眼于价值和事实的翻译伦理建构蓝图 ...	166
第三节 思路:“守经达权”	169
1. “守经达权”:实现伦理目标的有效途径	170
2. 应守之“经”:尊重差异	174
3. 当达之“权”:随机应变	177
4. 素质要求:“君子道者”	181
第四节 推行之道:引导与宽容	185
1. 欲速则不达的翻译伦理	185
2. 持续引导	186
3. 适当宽容	189
4. 富于韧性的牵引力量	191
小 结	191
第五章 翻译伦理与中国	193
第一节 对中国而言并非陌生的翻译伦理	194
1. 中国传统译论中关涉到伦理的言论	194
2. 中国当代翻译行业规范条例关涉到伦理的 规定	198
3. 与西方翻译伦理理论的契合点	204
第二节 中国译学界的翻译伦理研究概况	206
1. 兴起与发展	206
2. 主要成果	212
3. 重要概念	218
第三节 中国的翻译伦理研究的意义、局限和发展建议 ...	222

目 录

1. 意义	223
2. 局限	227
3. 发展建议	230
第四节 旨在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翻译伦理构想	232
1. 当前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诉求	233
2. 相应的翻译伦理构想	236
3. 效果期许	240
小 结	242
结 语 伦理:翻译研究的沃土	244
1. 翻译研究:步入伦理时代	244
2. “守经达权”:解开传统翻译标准的死结	246
3. 翻译伦理:助推中国的文化事业	249
4. 视阈局限:抛出引玉之砖	252
主要参考文献	255
后 记	273

引 言

作为一种人际关系的准则,伦理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其中也包括翻译活动。而作为一种交际行为,翻译往往伴随着译者、读者、原文作者、赞助人等行为主体之间产生的种种人际关系,不得不面临对这些关系的规约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与伦理发生关涉。译什么?怎么译?这些在很多情况下不仅是文本选择或是语言操作的问题,还是伦理的问题。一定的伦理观念能够从内心深处影响翻译的行为主体,使之做出一定的行为选择,进而影响到翻译的效果。本书试图围绕着翻译伦理这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以求取得一定的理论成果,主要通过对现有理论的梳理和提炼,针对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翻译所面临的伦理问题建构一定的对策机制,并就此探讨中国的翻译伦理问题,实现前者在后者语境下的进一步具体化。

1. 选题缘起

不论情愿与否,只要在社会中生存,人都不可避免地使自身处于种种人际关系之中。这些人际关系需要得到规范和协调,以使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配合、有一定的秩序,而不至于相互冲突、乱成一团。而行为规范通常通过两种形式来实现:一种是依靠权力来维持的强制性条令,另一种是依靠非权力力量(如荣

辱感、社会舆论、个人良知)来维持的非强制性规约。前者主要表现为法律、政策、纪律等,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伦理。在西方,英语 ethics (伦理)一词源自希腊语 ethos,本意是“本质”、“人格”,也与“风俗”、“习惯”的意思相联系。后来罗马人用 moralis 来翻译这个词,介绍这个词的西塞罗声称这是为了丰富拉丁语的词汇,它源自拉丁文的 mores 一词,原意是“习惯”或“风俗”的意思(何怀宏,2002)¹²。而在中国“伦理”一词自古有之。最初“伦”与“理”各自单独使用。“伦”的主要意思为“和”,如《尚书·舜典》中的“八音克谐,无相夺伦”,而“理”的原意为“治玉”,比如《战国策》中“玉之未理者为璞,剖而治之,乃得其鳃理”。在中国历史上“伦理”二字首次合用则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的《礼记》(何怀宏,2002)¹¹,比如《礼记·乐记》记载“乐者,通伦理者也”。在这里,“伦理”的含义为各种类别的人在相互的社会交往关系中应有的本分、职责。直到近代,日本人在对西方伦理学著作的翻译中,借用汉语中的“伦理”二字翻译了英语中的 ethics 一词。受其影响,中国人开始用“伦理”指人际关系的规律与规范。而到了今天,无论是西方的 ethics 还是中国的“伦理”都获得了对人际关系的规范意义。由此观之,作为社会的动物,人在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往往需要处理种种人际关系,就不可避免地使自身行为产生伦理关涉。确切说来,只要有了人际关系,人的行为就有了是非对错之分,伦理就会发生作用。像流落荒岛的鲁滨孙在孤身一人时进行的任何行为(比如他为了自身生活需要所进行的开垦、捕鱼、狩猎、食宿等)都不存在伦理问题,而在遇见星期五之后,他就无法避开伦理,如他需要定位和星期五之间的关系、确立二人各自的劳动责任、分享劳动成果的权利,等等。因此,只要不绝缘于人际关系,人就不可能生活在伦理的真空地带。在与人际关系形影不

离的状态下,伦理贯穿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进程,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其重要性更是越发突显出来。在当今社会,人们尽管享受着比以前更加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配备各种现代化设施的住宅、高速快捷的交通工具、方便迅速的国际互联网……,却在同时也面临着种种严重的伦理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的恐怖主义事件和民族冲突、人们由于精神空虚引起邪教崇拜、吸毒、性滥交和自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和疏远……在拥有日益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人类却难以毫不犹豫地宣称自己比以往生活得更加美好。在这一尴尬处境中,人类面临着紧迫的伦理思考。这样的思考既需要体现普遍性的人文关怀,也需要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具体方面,而翻译活动就是其中之一。

翻译产生伦理关涉的前提在于,它是一种无法绝缘于人际关系的行爲,确切说来就是一种交往行爲。自翻译活动开始,译者就在与不在场的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进行着对话。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指出,每个人在理解时不断敞开自己的前见,在此过程中不断将自己的视阈与其他视阈融合,因此“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是独立存在的视阈融合过程”(伽达默尔,2007)⁴¹⁶。译文出自于译者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正是译者分别与原文作者、译文读者视阈融合的结果。译者首先是原文的读者。他在阅读原文的过程并非独白,而是与原文作者的对话,这是译者与原文作者的交流。就如郭沫若比喻的那样,翻译的过程如同男女之间的恋爱结婚——“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男女结婚是要先有恋爱,先有共鸣,先有心声的交感。我爱雪莱,我能感听到他的心声,我能和他共鸣,我和他结婚了。——我和他合而为一了”(郭沫若,2009b)⁴⁰⁵。这种双方不在同一时空的交往行